

# 中国电影

## 论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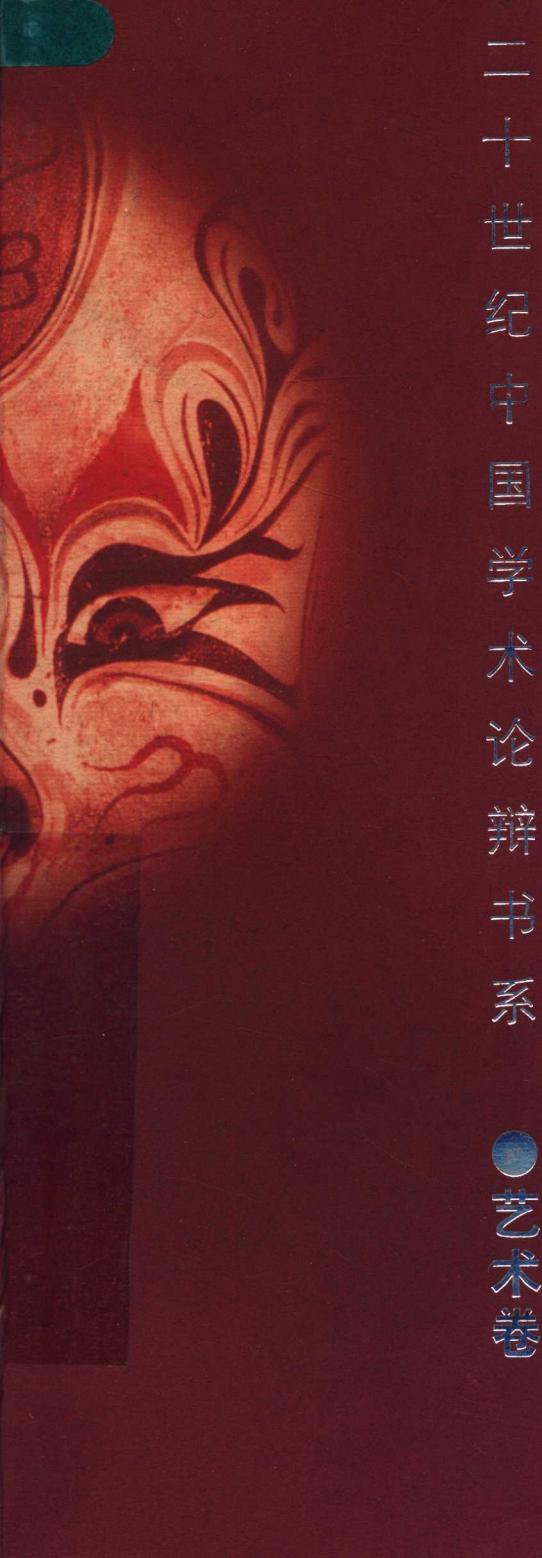
主编 / 倪震

张智华 / 史可扬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艺术卷



J905. 2/18

2007

# 中国电影论辩

◎张智华 / 史可扬 / 著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艺术卷 ◎主编 / 倪震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电影论辩/张智华、史可扬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 5

(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

ISBN 978 - 7 - 80742 - 200 - 6

I. 中... II. ①张... ②史... III. 电影评论—中国  
IV. J90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3759 号

**书系分卷名:**20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艺术卷

**分卷主编:**倪震

**书 名:**中国电影论辩

**作 者:**张智华 史可扬著

**书 系 总** : 李晃生

**责任 编辑**

**责任 编辑:**黄朝晖 李晃生

**书籍设计:**梅加强 王玲云 朱燕 李仲熙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网 址:**WWW. BHZWY. 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6. 25 **印 数:**1—5000

**字 数:**41 万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 50 元

ISBN 978 - 7 - 80742 - 200 - 6

---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0791 - 689479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总序

邓光东

翻开中华民族五千年史册，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刚刚过去的公元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最为复杂尖锐，斗争最为激烈，社会变革最为急遽深刻的一百年。

这一百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完全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百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远涉重洋、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或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开拓创新，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慷慨赴死，涌现出一个个思想巨擘、学术巨人、英雄豪杰、民族骄子，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活剧。一百年，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公元二十世纪的中国，却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现象，既

是历史奇观，也是历史奇迹，是中国历史的壮举，为世界历史所罕见！它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强决心、非凡勇气、无穷智慧和巨大力量，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伟大民族、优秀民族！

二十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发生遽变，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打破生产关系的束缚，而经济基础的变革需要思想解放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因而纵观古今，放眼中外，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次社会变革无不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为先导，以百花齐放、学术繁荣为前奏。如果说，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适应并推动了社会变革，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则解放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那么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是在各种思潮相互冲突、相互交锋、相互激荡、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背景下发生急速而深刻变化的。这个世纪的学术繁荣，是继春秋诸子学说之后的一个学术思想巅峰，其问题之复杂与纷繁、规模之巨大与宏伟、内容之丰富与新颖，又非春秋战国所能比拟，而其对社会进步影响之深远，则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

如今，二十世纪渐渐远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于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中国人民，却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当忘记的。这个世纪，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中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纪，是中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世纪，也是最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清理和评估、反思和总结的世纪。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从来没有中止过学习与实践、思考与奋斗、探索与拼搏；因为，在这个世纪中，中华儿女有太多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悲痛、经验与教训。仅就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术领域而言，就造就了许多重要学术人物，涌现出许多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流派，进行过许多重要的学术论辩，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所有这些，像奔腾不息的江水，像璀璨明亮的群星，像振聋发聩的春雷，像熠熠闪光的瑰宝，汇成巨大的精神动力，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所有

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百年之交、千年之交的门槛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回顾与反思、梳理与廓清。

哲学社会科学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学术，归根到底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晶。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时代的巅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性思维。中华学术，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问题，历来就与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相联系。它既是一个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个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所谓纯学术问题当然存在，但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我不赞成把所有的学术问题都与政治挂钩，特别不主张学术问题政治化。但有些学术问题确与政治密切相关，尤其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相关。只要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二十世纪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发生的一次次学术论辩或学术争鸣，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在上述几个领域的学术论辩问题时，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详尽地占有材料，做一番去伪存真、去芜存精、由表及里的工作。认真地回顾和总结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对经济、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历次论辩或争鸣，反思其是与非、成与败、功与过、得与失，寻找其发生的历史、社会缘由，探究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彰扬前贤、昭告后人，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所幸的是，黄楠森、邢贲思、方克立，龚书铎、李文海，费振刚、

韩兆琦、郭志刚、田本相、倪震、梁茂春、邓福星诸同志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欣然分别担纲《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哲学卷、史学卷、文学卷、艺术卷主编，为本书系的学术品位和书稿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从1999年底开始就积极策划编辑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经过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已将该书系列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书系的作者和主编们为撰写书系，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翻阅了无数重要文献，耗费了许多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学术界的不少专家，纷纷关注和支持该书系的出版。所有这些，令人振奋，令人欣慰。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是一套熔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炉的大型系列书籍，是二十世纪关于中国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重要学术思想的汇要，共四卷四十册。书系的作者们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论述方法及酣畅流利的文笔，努力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述评结合”的原则，力求做到反映历史客观真实，介绍观点全面准确，叙述过程简明扼要，评论评价公正公允。全书基本理清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领域百年学术论辩主要问题的脉络；对所列论辩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析；以历史和全局的目光，对一百年来各种重要论辩资料进行重新审视，从而使人们对历次论辩产生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于该书系是作者个人的科研成果，虽经主编们认真审校，仍属作者自己的作品，见仁见智，亦属自然。

值此书系陆续付梓之际，受各分卷主编的委托，写下以上这些话，是为序。

2004年11月

## 主编前言

倪 震

20世纪是中华民族摆脱积弱和屈辱，走向伟大复兴的转折期，是付出民族抗战和社会动乱的巨大代价而走向繁荣、民主的社会进步期。这样重大的历史进程，必然引发社会文化思潮的激烈论争，围绕着启蒙和救亡、革命和战争、和平和发展，各派学说盛衰纷呈。除旧更新的历史冲动，中西文化的交融汇合，体现在几代学者的思想传承中。学术发展和社会改革、制度建设、民众呼声紧密相联，构成了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的时代特色。

中国电影文化思潮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分支。

作为20世纪新兴媒介的电影，从它传入的那一天起，就和中国社会的演变及民族政治的进程紧相关联。因此，中国电影的思潮论辩、电影批评建构、电影理论模式，就和别的国家明显不同。寻踪中国电影的百年足迹，既可见儒家文化传统的明显印记，更可显示现实政治的深刻烙印。电影和政治互为表里又荣辱与共的命运，恐怕是20世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 一、百年中国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决定了电影与社会、电影与人民大众是中国电影文化的核心命题

中国电影文化论辩，在一个世纪中虽然论题更换不迭，却始终围绕着电影和社会、电影和政治这一基本问题。这是跟20世纪中国面临着民族抗战、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虽然在不同时期先后借鉴、吸收过若干西方电影批评方法、关注过世界电影理论动向，但中国电影社会学始终围绕着电影民族命运、电影社会发

展而展开。这一主题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电影学者的论述中，形成电影批评的中心话题。

在西方，自从电影成为一种独立艺术和大众传媒之后，电影争论的焦点很快聚集在电影本性的追问、电影审美的界定和电影艺术形式的探讨上，相继形成电影心理学、蒙太奇理论、纪实派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化学的各支脉。围绕着电影自身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审美价值观的论争绵延不绝。当然也与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相联，形成了电影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但是，关注电影本性和电影作为艺术的主题，始终独立于电影和社会、电影和政治的关系之外，形成独立的学科门类，自成系统地展开着电影理论思维和艺术美学的建构。

而在中国，电影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电影社会学作为大一统的学科，把政治文化、社会批评和电影特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的论辩和阐述，电影特性和电影审美作用常常作为辅助性的论据，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从电影社会功能，甚至政治功能评断它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取舍。不少的电影论争都来自社会政治变动，尤其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这种现象的持续导致了中国电影的文化论辩和理论争鸣始终围绕着政治主题和宣传中心，成为一种电影政治话语系统。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才开始改变这种一元化的电影文化批评局面。

当我们简略地回顾百年中国电影理论历程时，电影社会学的论辩足迹清晰可见。

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在所有姐妹艺术中，电影是受五四洗礼最晚”的艺术门类，但电影创作和电影批评进入 30 年代之后，已明显地反映出新文化思潮的涌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体现在进步的电影工作者的论著中，其后成为整个 20 世纪指导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思想体系。

无论是中国电影最早的批评文字所提倡的“改造社会”、“警惕

人群”、“挽救劣风败俗”的文化主张,还是郑正秋等人极力倡扬的“教化人生”的电影宗旨,都体现了早期电影的伦理至上功能。可以看做是中国电影批评的启蒙阶段。30年代围绕中国电影文化之路的论争以及“软性电影”论者与左翼电影人之间的论战,尤其鲜明地实现了社会学批评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在这场论战中,左翼电影评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在阶级和社会、大众和小众、内容和形式、教育和娱乐等方面,展开了对“软性电影”论的犀利批评和对电影民族化、大众化社会功能的明确肯定,为新文化电影运动和批评方法的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探讨电影的独特表现手法,电影的叙事特征和电影节奏等专业性问题方面,“软性电影”论者,如刘纳鸥等人作出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属于相对全面而系统的电影特性研究。中国电影史的论者在1990年以前,始终是充分肯定前者而“忽略”后者的理论贡献,反映了意识形态主导电影社会学的一元化倾向。

从20世纪30年代以降,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电影救亡批评,还是战后的电影社会批判时期,思潮论争的焦点,当时都是迫切的民族救亡和社会危机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1949—1966年的“十七年电影”时期还是1966—1976的“文化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确立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电影社会学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作用,被提升到空前的高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电影建设时期,电影社会学在树立工农兵英雄形象、深化银幕上的艺术典型、完善电影的民族风格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配合。但是,自50年代开始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围绕着电影中的历史意识问题(《清宫秘史》《武训传》)、工农兵形象真实性(《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电影与观众的关系(钟惦棐《电影的锣鼓》)及如何对待中国30年代电影传统等问题展开的历次批判,都体现了左倾政策支配下对电影社会学方法的歪曲。严格地说,这些批判已不能用学术“论辩”的概念来界定,而是一种政治运动或政治斗争的插曲。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它正是50—70年代政治思潮

在电影领域里的反映。

中国电影社会学的主导地位,一直延伸到跨世纪的当下。今天,它仍然是主导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电影文化产业的思维定势。诚然,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理论多元化格局初步呈现,不同学科的电影理论得到确立和发展。甚至电影产业研究也迅速展开。但是,电影社会学在诸学科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仍然突出。例如,90年代以来在探讨主旋律电影社会功能和先进文化的舆论导向方面,电影社会学依然是主导性的方法。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思维定势和理论话语模式,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任务导致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心理延伸的表现。只不过在全球化经济、文化剧烈竞争的形势下,中国的电影社会学方法论也面临与时俱进的时代任务。

## 二、政治民主、学术自由是电影文化论辩沿着轨道健康发展的保证

学术繁荣和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思想的自由争鸣,在某些情况下,“论辩出真理”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争鸣和论辩的必要条件是政治民主和法制健全。只有在充分的民主和保护知识权利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学术自由才能够完全发挥,学科发展才能健康茁壮。中国电影文化历程的世纪回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是丰富而复杂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方面,社会主义电影起步明朗刚健,工农兵形象和人民解放斗争的故事,改变了旧中国电影题材狭窄、人物形象局限的面貌,拓展了中国电影的艺术视野。但另一方面,时起时伏的“左”倾思潮,使正常的电影创作和电影评论屡遭挫伤。盲目夸大阶级斗争,主观猜想、指鹿为马、无限上纲的兴师问罪,给50—60年代的电影生态造成过很大的破坏。到了1966—1976年的“文化革命”时期,则达到盲无法制、一片荒芜的地步。在回顾中国电影百年历程时,这是不能不痛定思痛、反复总结和力求杜绝的历史教训。

20世纪50年代,电影文化的第一次寒冬冰霜期是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从上而下席卷全国的批判运动,其影响远达半个

世纪，三代中国电影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它的影响所及，是艺术家正常的创作探索和评论家应有的学术探讨统统纳入政治行为和政治结论的轨道。“将电影问题与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这一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还将对政治思想问题的讨论，演变为对创作者、批评者的组织处理。”<sup>[1]</sup>开启了政治索隐、无限上纲的非学术化的电影批评的先例。

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和中国陶行知基金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1951年，曾发生过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讲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场批判有它特定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上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直接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sup>[2]</sup>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展开的对钟惦棐的文章《电影的锣鼓》的批判，又一次看到运用行政手段和组织处理对待电影学术论辩的做法，使一位发表个人见解的电影评论家被剥夺写作权利二十多年之久。而且，与钟惦棐有关《文汇报》和《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甚至青年剧作家等，也难免受到株连。

1962年，电影剧作家和理论家瞿白音撰写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对改善当时的电影创作建言，意在促进社会主义电影的良性发展。但在1966年后受到严厉的批判，署名丁学雷的文章《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离开电影学术讨论而将作者纳入政治反对派的阵营。至于1967年文化革命高潮中，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

《清宫秘史》一文，则完全是借电影之名，行政治斗争之实。50年代置电影文化人于非命的文化讨伐，终于演变成危及国家机器、迫害国家领导人的民族悲剧。

学术自由、论辩规则、知识权利、法律尊严，既是上层建筑又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反映。民主化准则和学科繁荣是互为因果的。8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学术论辩呈现出民主化的初步景象，对电影文化批评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发生过几次重大的电影学术论辩，事关中国电影的历史评价或主流电影模式的地位问题。由于学术论辩民主化环境的建立，使得各方的理论观点，得到充分的展开，而丝毫没有涉及论者的安危。

1986年底到1987年近一年间，围绕邵牧君的文章《中国电影创新之路》，电影理论界展开了持续论辩。由于邵文提出“30年代的进步电影完全比不上40年代后半期的进步电影”和“全国解放后的30年为电影创新沉寂期”等观点，涉及到对左翼电影和新中国电影的评价问题。如果在江青“四人帮”时期，文章作者的获罪之嫌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各家舆论深化了论争，就“创新”概念的界定和各时期中国电影的成就、得失，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分析，加深了对中国电影史的认识，也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986年秋，当时的年青学者朱大可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对中国主流电影的代表之一的谢晋电影进行全面的批评和负面性评价，引起电影界的强烈反响和争鸣。通过对谢晋电影模式的深入解剖和历史评价，实质上涉及到儒家文化渊源和道德化叙事及好莱坞影响等等问题，深化对了中国主流电影历史沿革的认识，引发了对上海电影学派的全面回顾和中国主流电影的与时俱进问题。学术论辩和保护少数的游戏规则确立，标志着中国电影文化环境正处于不断优化的进程之中。

### 三、从电影观念的论争到多元化理论格局的确立

积极的学术论辩有时不止于命题本身的结论，而会产生突破

传统格局和规范的作用，引发超越性的理论质变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围绕电影观念和电影类型的学术论辩，就起到了学科发展的催化作用。

80年代初期，在全社会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潮流中，电影理论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争鸣局面。当时，除了注重克服银幕虚假和“四人帮”余毒之外，争鸣的焦点很快转向电影本体和电影语言的演变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电影技巧的讨论只能充当思想主题的陪衬，加上“四人帮”闭关锁国的电影政策的影响，促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关注国际电影发展的迫切心理，导致了人们对电影本体论探讨的热情空前高涨。因此，对于电影自身的本体属性、语言物质、时空观念、叙事规律……等等的研讨，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深入的程度。

不但电影理论工作者纷纷参与，相当多的电影创作者也卷入到这场关于电影本体论的讨论中来，电影界呈现出创作和理论双向交流的活跃局面。

在这场关注电影本体的论辩中，首先是围绕张暖忻、李陀的文章《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非戏剧化”的争论，引起了观点不同的学者的积极参与。由于电影戏剧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电影创作和理论界最为关注的中心问题，“影戏”之说和戏剧式电影是中国主流电影源远流长的基本模式。因此，当论者从电影本性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电影特性及其美学本质时，就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国电影的传统思维模式，赞成者和反对者形成尖锐对峙的两派。在论辩中，双方就电影如何保留“戏剧性”而克服“舞台化”、注重“现代性”而防止“现代派”；强调“非戏剧化”却反对“非性格化”等等，展开了多角度的讨论和辨析。

围绕电影本性的一场激烈争论，是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1980初，张骏祥发表了《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电影就是文学”，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的根本问题在于电影作品的文学价值。这种“电影的文学价值”论的根源，是剧本中心论。电影的声画、时空、

造型诸方面仅仅是体现“文学价值”的手段。张骏祥的论点虽然有许多赞同者，但也受到了反对者的质疑。站在电影是一种独立、完整的艺术表现形式的立场来看，电影思想内涵和美学价值跟它的表现手段是血肉相连、与生俱来的关系，不存在用“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去表现文学才具备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电影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是电影独有的。它跟文学价值和文学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这场争论不仅厘清了模糊的概念、界定了文学与电影不同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它使电影在美学上的独立性和运作上的自主性得到了承认，使电影作者的原创性地位得到了初步的确立，而不再是永远解释他人思想的平庸的工匠。

很显然，上述两场争论的起点，是要讨论电影语言特性和追问电影的本质，但经过持续而广泛的论辩，却发生了电影本体理论从综合的电影社会学中分离出来的学科独立的过程。对不同于西方电影理论发展史的中国而言，这种学科分化的进程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而它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新时期，是中国电影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

同样的现象，也在相继出现的电影文化学理论、电影产业理论确立的过程中得到印证。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标志之一，是不同学科的分化和多种理论方法的确立。而分工细密和方法论多样化，是现代科学进程的明显特征，同时也是中国电影理论面对全球化竞争不可回避的自我完善。

而这一进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健康、民主环境中的电影学术争鸣。这正是中国电影理论在走完一个世纪的风雨里程之后，迎接未来的信心所在。

本书编著的初衷，是纵观 20 世纪中国电影文化思潮的历次论辩并从中梳理电影理论历史的线索。本书的写作方法，首先是尽量搜集和尊重各次辩论的原初资料，复原和展现论争各方的学术观点，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必要的论述和阐释，以便于读者了解论辩当时的历史真相和学术意义。本书的两作者张智华博

士后和史可扬博士,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在电影理论研究上踏实精进。他们为本书的编著工作付出了辛勤而细致的努力。

本书在搜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尽力却不能如意的困难,因此所及各章的原始材料遗缺之处,以及对各次争论阐述失准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多多赐教,在此深表谢意。如有再版的机会,将尽力弥补和修订。

#### 注释:

- [1]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第24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
- [2]见《中国电影批评史》第249页注1,原文见《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党史通讯》1985年第12期。

# 目录

## 绪 论

001

### 第一章 20 年代的“载道”与“娱乐”之争 017

一、历史背景 017

(一) 欧美影片占据大量国内电影市场 / 017

(二) 国产影片魅力前行 / 019

(三) 电影批评起步 / 021

二、电影理论论辩概况 023

(一) 电影应“有功于世道人心” / 023

(二) 电影的娱乐性 / 027

三、简要评价 030

### 第二章 30 年代围绕中国电影“硬性”和“软性”的论争 032

一、社会文化背景 032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入 / 033

(二) 中共“电影小组”的成立和活动 / 034

(三) 电影创作的景象 / 042

二、论辩的概况 044

001